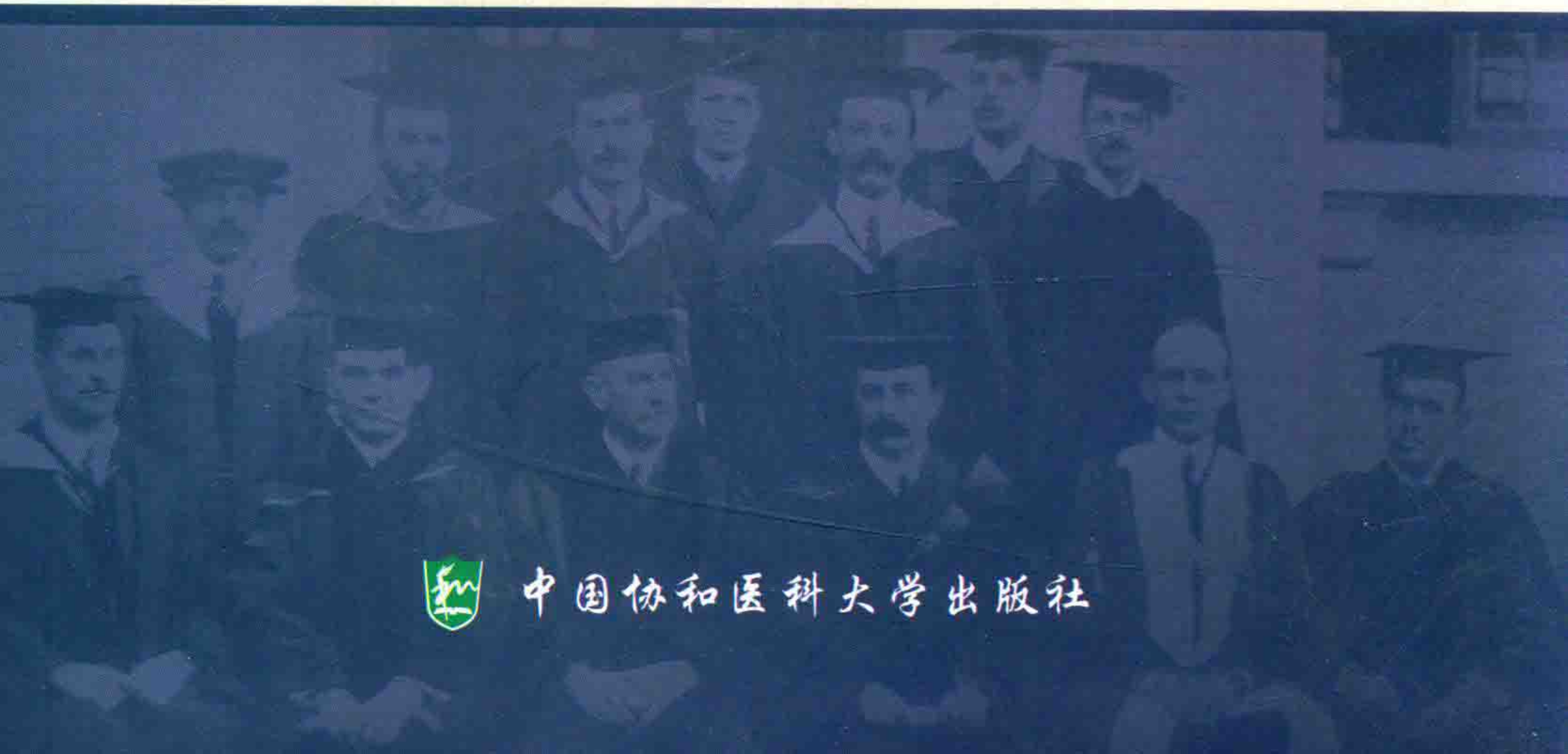


协和

医学堂



协和医学堂
蒋育红
译编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协和医学堂

协和医学堂 编
蒋育红 译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协和医学堂 / 蒋育红译.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 - 7 - 5679 - 1033 - 1

I. ①协… II. ①蒋… III. ①中国协和医科大学 - 史料 - 1906 - 1916
IV. ①R - 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1209 号

百年来, 北京协和医学院历经辉煌和沧桑, 为现代医学在中华大地的传播与发展、为解救病患的疾苦以及为民族的解放和振兴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近年来, 本着追念前贤、以启后人的初衷, 我社翻译、出版了一批与“协和”历史相关的珍贵书籍, 填补了“协和”史研究中的诸多空白, 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受限于时空背景及所处立场之差异, 作者对于不同历史事件的解读以及所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宗教观等, 均可能存在一定偏颇, 也并不代表我社立场。

协和医学堂

译者: 蒋育红
责任编辑: 顾良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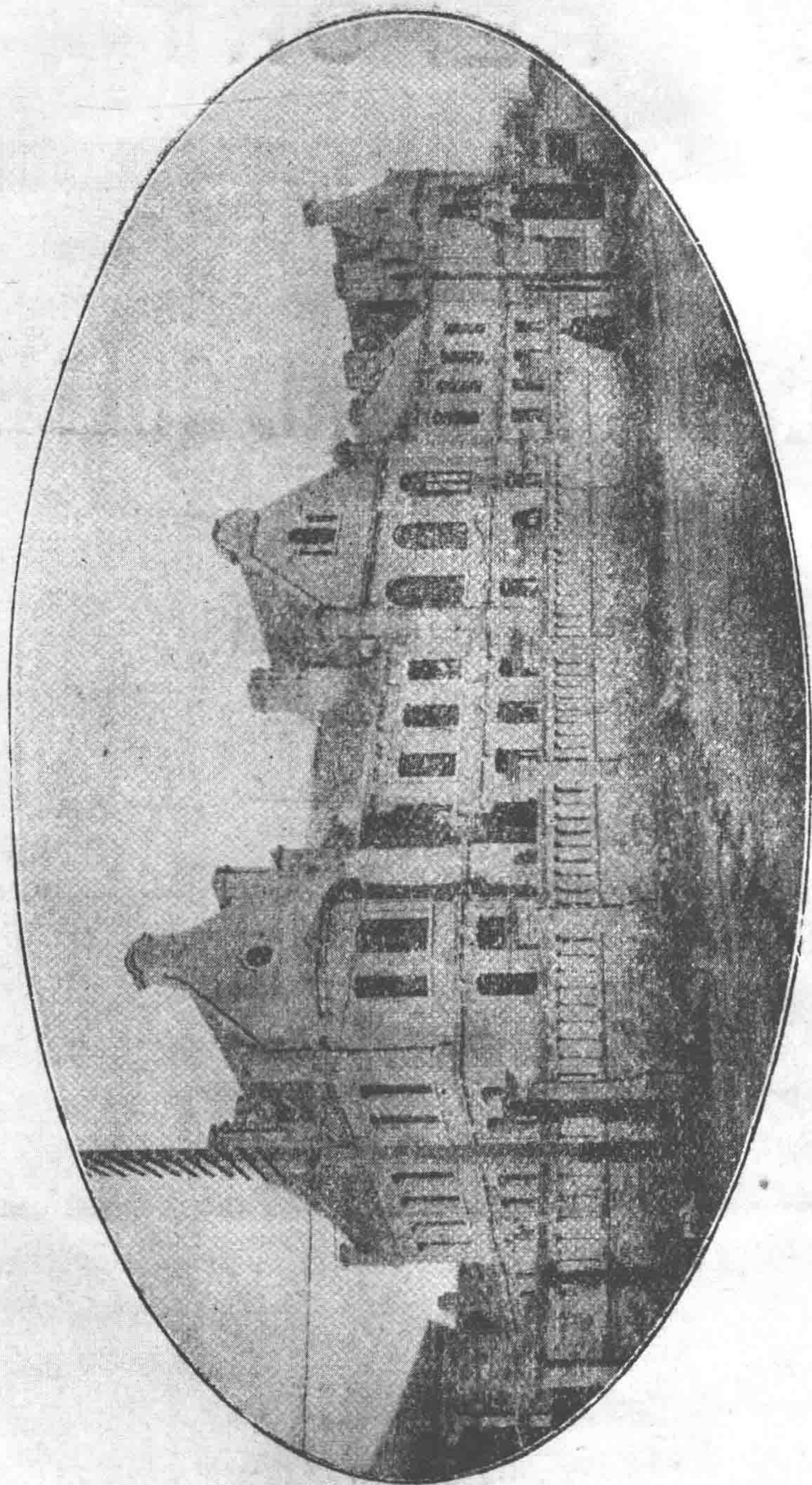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431)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16 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6.00 元

ISBN 978 - 7 - 5679 - 1033 - 1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

协和医学堂（北京）

译者序

XIEHE YIXUE TANG

协和医学堂（北京），英文名称为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在中国医学传教历史上是一所与众不同的医学院。协和医学堂（以下简称医学堂）最开始是由六个英美教会（主要是英国的伦敦会，英文名称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联合开办的，是华北教育联盟（华北协和文学会，North China Education Union）的以协和（union）命名的三个教会学校之一。其建筑完工于1906年，同年3月开始使用，宿舍区于1908年完工。1915年7月1日，洛克菲勒基金会旗下的罗氏驻华医社（现称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开始全面接管医学堂。当年12月12日，由英国伦敦教会总会全权代表金修真签定买卖契约，将伦敦会在东单牌楼附近共5处房产（包括协和医学堂）卖给了CMB。（见2018年《中华医史杂志》——“近代不凡的英国医学传教士科龄”）。

协和医学堂存续时间并不长，从1906年开办到1916年医学堂将未毕业的几届学生转到山东齐鲁大学医科学习（毕业后依然颁发医学堂文凭）总共十年。1906—1916年这十年间的年度报告（英文）原籍保存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感谢档案室认真负责的工作及CMB的大力资助，报告虽然历经一百一十多年，但保存完好。

作为珍贵的档案，又是英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接触到的。在我国，外文书籍在语言、成本、可及性等方面有很大局限，而翻译版正好可以弥补这方面的局限。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自英美的教会在中国医学传教事业需要相关的一手、二手资料，以便做出更准确的判断。协和医学堂年度报告的翻译版为研究或喜欢历史、宗教、慈善的人士提供了研究材料，为更多人士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前身——协和医学堂，还原其历史原貌、澄清很多模糊印象而特意翻译的。本打算于2017年协和百年校庆之际作为百年丛书出版，但由于翻译者本身有另外一本合编书出版，故推延了出版。

可以说协和医学堂是其开办期间中国最好的医学院之一。直到其关闭，医学堂都是唯一一个得到政府认可的学位证书的、教会学校和非官办医学院校。与当时多数官办和教会医学院校不同，医学堂开办之初就是5年制，尽最大可能与欧洲医学院看齐。从1906年开业之初的不到50名学生，到1915年被CMB收购时的150名，可见其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医学堂教学管理日渐完善；学生的质量也是一年比一年提高。学堂基础建设——楼宇、设备等也在不断提高完善中。

施医院英文名称为北京医院（Peking Hospital）病人越来越多，满足不了需求。1912年又在新开路胡同新建成了一所“新医院”，有餐厅、厨房、华人病房还有高级私人病房。但一直未使用，直到1914年4月16日新医院开业，医院接受中国各地病人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医院在管理上日趋完善，病例保存完好。1915—1916年度报告显示，医院的报告已经用疾病国际分类标准填制表格了，疾病分类、治疗情况、治疗结果，是否手术等记录完整、详细。

然而，医学堂开办得一直非常艰难，主要体现在财力缺乏与教职工严重不足。各种资源不足限制了其发展，正常教学尚且很难保证，更无法开展医学研究；这是其与洛克菲勒基金会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在1920—1930年代，北京协和医学院在亚洲是医学研究开展最好的医学院，享有世界盛誉。（请参阅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协和百年纪念文集》中达尔文的文章）。施医院虽然分内外妇等科，但比北京协和医学院管理下的先进教学医院要粗陋、逊色很多。

医学堂与医学院另外一个根本区别是医学堂基督教会的性质和特点，这在报告中随处可见。作为教会学校的年度报告，在报告中宣扬福音和基督教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基督教在中国开展情况、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对疾病、宗教等看法，也了解到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及生活习俗。

关于协和医学堂（北京）及其与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个谜。北京协和医学院与协和医学堂有着历史渊源和传承，但以医学教育与宣教为己任的教会办的医学堂与以雄厚资金实力为后盾的美国慈善资本家所办的、以医学科学为初心的医学院从根本上就有天壤之别。为了实现自己对教会组织的承诺，CMB拥有且管理下的医学院保留了医学堂的影子，比如学校名称“协和（union）”的保留，所设立的奖学金以两个对医

学堂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科龄 (Thomas Cochrane) 和文海命名；医学院一直保留着医学堂的娄公楼 (Lockhart) 等。

医学堂只存续了 10 年，但其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及各种危机与机遇、转折。1912 年中华民国元年，教育部取代清朝的学部，蔡元培担任第一任总长，医学堂从清廷的“宠儿”经历了改朝换代，需要面对封建帝制到“民主制”的过渡的巨大变化。1914 年洛克菲勒派考察团到中国，此时正值医学堂计划并商讨扩大规模之际，医学堂管理者因而密切关注并对美国资本注入燃起极大热情，对罗氏驻华医社 (CMB) 给予非常大的期望，认为是巨大的机会。CMB 对医学堂也非常赞赏。1915 年底，医学堂的财务开始归 CMB 负责，同时以北京协和医学院 (PUMC) 在纽约州注册。除此之外，CMB 做出了另外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用英语教学。由 CMB 出资，医学堂在读的三个低年级班转入齐鲁大学医科。(见 2012 年《中华医史杂志》本作者的文章)。

这里一定要提下医学堂的开办者和早期运行的关键人物——来自英国伦敦会的医疗传教士科龄 (1866-1953)。“科龄经历了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巨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作为英国传教士，他在主要以蒙古族人为主的辽宁朝阳亲身体会了中国的贫困和缺医少药；经历了义和团运动对外国人及中外基督徒和传教士的憎恨与追杀、之后得到中国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青睐和赏识，又经历了封建帝制的崩溃到中华民国建立，亲自将自己缔造的医学堂转交到美国的资本慈善组织旗下。他还亲历了中国疫情的暴发、中国人对疾病卫生等概念的认识及转变，国际社会英美实力的角力及对中国的影响。科龄在中国时间不长，但其经历更是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内部医疗卫生、教育、思想意识乃至世界治理格局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的缩影。”(见《中华医史杂志》——“近代不凡的英国医学传教士科龄”，2018)

本书有很多参考价值。除了报告中施院所医治的各种病例提供了当时医疗情况的研究价值外，读者还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人当时的就医态度、中国现代西方医学的发展、西方人及中国人对传统中医的态度；还可以通过报告，了解并研究当时中国各阶层的社会经济状况、信仰、意识、价值观、社会关系，乃至国家层面的外交、中外关系、慈善等。其中发言稿也是非常珍贵的资料，对于了解当时中外重要人物的思想有很大帮助。书中还配有很多珍贵的照片。

最后，译者要感谢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的大力协助，在翻译医学堂的中国人名、外国人中文译名、课程中文等专有名称的翻译上，档案室员工特别是张霞老师给予了大力协助，协助查询了档案，还原了历史；协和八年制学生王诗蕊同学出色的医学病例的翻译保证了本书医学方面的准确性，体现了协和八年制学生优秀的素质。中国协和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及顾良军编辑也给予极大的帮助，查询到了难点问题，做了杰出的工作。没有他们出色的、专业的付出与质量保证也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

译者 蒋育红

2018年2月，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

协和医学堂 1906 年度报告	// 1
协和医学堂 1907—1908 年度报告	// 24
协和医学堂 1908—1909 年度报告	// 38
魏林 - 协和医学堂 1909—1910 年度报告	// 52
协和医学堂 1910—1911 年度报告	// 76
协和医学堂 1911—1912 年度报告	// 107
协和医学堂 1912 年度报告	// 135
协和医学堂 1913 年及 1914 年 1 月至 6 月报告	// 166
协和医学堂 1914—1915 年度报告	// 200
协和医学堂 1915—1916 年度报告	// 231

协和医学堂

1906 年度报告

协和医学堂结束了第一年的工作。在本报告的结尾处可以看到首次通过专业考试的学生名单。

1906 年初，医学堂大楼完工，并于 2 月 12 日、13 日举行了开办典礼。

2 月 12 日下午，在学院大楼的北翼为庆祝开办举行了隆重的宗教仪式。伦敦会的宓治文牧师（Rev. S. E. Meech）主持了仪式。宓治文先生在开场发言中既解释了医学堂在教育联盟项目中的地位，也强调了在这个强大的联盟行动的意义。接着，他向听众介绍了中华圣公会的史嘉乐主教（Bishop Scott）。史嘉乐主教的整个讲话，慷慨激昂，他说：

我们在这个开办仪式上聚集一堂，当我们看到医学堂的名字——协和医学堂，两个理念马上突显在我们的脑海中。这就是联合（协和 Union）及医学科学。在我们的意识里，这两个理念哪个也不能少。的确，这两个理念在今天是不可缺一。

作为基督的信男信女，是同一个上帝及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将很快地欣喜地看到，联合与医学科学在我们思想中看起来虽是相距甚远的两个理念，但它们都是我们神圣的主的教义和工作中非常显著的特质。

我们没有必要强调人们关注这样的聚会，福音故事里每一页都显而易见地佐证一个简单的事实，既上帝在其世俗神职工作中意义伟大且卓著的一部分就是医治病患。我们也不必提醒自己，基督的这部分世间生活是如何被他的使徒汇聚。使徒见证了一切，以其话说“主所到之处积德行善，医治被魔鬼折磨的病患”。

长期以来，人们意识到，医治生病之人、照顾生病之躯等同于耶稣基督的工作，人类本性也是上帝之子的本性。在传教士的工

作中没有哪个工作得到普世众生如此的感激，不仅皈依基督神圣本质的热情信徒表示感激，那些仅承认人类独有个性，如权力桂冠与荣耀的人也同样持有感激之情。在我们复杂的传教工作中，没有一个分支能像医疗那样如此不费力地得到所有善男信女的资金捐赠。

所有的人都被此吸引，且所有的人将会欣喜地看到，中国华人以其良好的判断力与慈善本能而将会越来越被吸引到这方面来。所有知道这样一所学院的人，都应该充满感激之情，它屹立于中国的首都正中心位置。虽然这个帝国最高权力机构及呼风唤雨的人们，有意愿来强迫人们相信这是为其的利益而设立，但是这所学堂是在这个国家至高无上的人的赞扬、欢迎、并慷慨资助下矗立起来的。我要说，所有人都必须高兴地看到这所学堂在人员上及材料设备上都很完善。近乎半个世纪之前，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始神圣工作修成正果。这项神圣的工作一直在继续，中间没有间断，直到这所学堂开业。学堂的员工在我们的母国（大不列颠）接受了最好教育并极富经验，将由这些极具资质的成员照料生病及遭受痛苦之人。然而，这所学堂的开办不只是为了满足一时之需，同时它还要将这些巨大优势以最实用与高效的方式传递给华人。我们由此希望能看到在下一代的华人中，在医学内科和外科学的每个分支中，都有功成名就的华人出现。

我们也不妨祝贺今天出席开业典礼的、在医疗和传教工作中的先驱代表们。我们确信正在寻求把上帝所乐于赐予我们的，以最完整和最好的形式——现代医学科学和实践，这一不可估量的最好恩赐给予华人。我们所做是上帝非常乐于做的，他曾经把治愈病体当作自己拯救人类灵魂的重要服务工作。他派自己的信徒去天国王朝布道时，告诫他们要“治愈病患，净化麻风病人，起死回生，驱逐魔鬼”。用那些一直以来就是基督慈善的语句，恳求信徒：“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

我们今天不可以忘记另外一个理念。正如我在最开始说的，你们的学堂的名称“协和医学堂”，让我们想到的是作为深思熟虑的基督徒，不能忽略在我们神圣的主的教义和行动中团结的内容。上

帝圣体中圣人们神秘的团结本性正是救世主在我们面前树立的榜样和形象。这本身就是救世主渴望在其身上看到人们所表现团结的深度、现实性与完整性。“救世主可以把散落在外域的上帝之子们聚集起来。”一个信徒宣称这是他通向死亡之赎罪的终点和目的。“上帝可以把所有的东西聚集在基督一身。”这是另外一个信徒在救赎计划中所设定的终极目标。

因此，医学堂这一宅心仁厚的慈善之举，在医学传教中这么卓越，已经一次又一次地提供了聚会之地而成为“神圣之地”。由此，所有热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们都有可能在上帝保佑、上帝之子所承担的疗愈与救济的那部分性质的工作中统一立场。作为组成该联盟的一个教会，我们圣公会也为四个年轻的华人基督徒在医学校学习做了有价值的工作。还有一位学生目前在伦敦会学习，我希望他能在那所学堂完成学业。其他人无疑也以相似的方式，在与各种不同教会长期从事的相关工作中获益。将来可以看到，北京城及周边的所有医学生都到这所学堂接受教育。由此建立起来和保持的交流将不容置疑地加深和强化我们的联盟与华人基督徒之间思想和现实的连接，而这些人肯定还会再把各个教会的某个工作联系起来。我们相信，这将很大程度上在西方基督徒间的鸿沟上搭建起来桥梁。我几乎可以说，我们这些西方基督徒所困扰的缺陷与罪恶已变成固化。上帝期许这样结果不会注定出现，但也可能会出现。如果这样的结果是上帝永恒的目标相一致的话，那么团结起来能得到更大的结果。现在看起来已经在华人基督徒身上预示了前景，有可能对我们自己产生反作用。而我们所属的教会以及重新团结起来的基督教精神的伟大回馈将会重现回到我们身边，作为将福音传播给“遥远地方”的自我牺牲之劳动与自愿放弃自我生活之结果。我们不知道这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不是万能的上帝的智囊，而上帝总是智慧的。我们知道联盟超越了语言的力量，把人们团结在一个鲜活的信仰周围。上帝就是这个信仰的领袖，这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很多人可能大多数是信仰基督的人，相信我们的主在他受难之夜的代祷中谈及团结这个问题上的暗示有些异样。其他人则有此强烈感觉，谴责耗费精力和金钱在各种机械及各种重叠的工作上，还有另外一些人

则又以不同机构的视角，常常是敌对的。他们侧重华人之间的不那些尽人意的画面，去角逐争取那些能够皈依一种信仰的灵魂。

我希望回到座位之前，利用这个讲演的机会。我也十分高兴地利用这个机会说，三十一年来的传教经验在我内心中对万能的上帝充满神圣的感激之情。我感谢其衷心的、兄弟般的感情和同伴之情，这些是那么真实美好，以及在教义容许的前提下，在华的各个不同派别教会团体成员之间的诚心合作。有人说传教士中经常发生的争辩及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在华人中传播福音的主要障碍。我认为这完全不对。这是在华传教士发挥神圣精神的证明与表现，几乎毫无神学怨恨与派系纷争。而且如果有某种氛围的话，也是一种真诚团结精神的氛围在盛行。

过世的大主教本森（Benson）是最有智慧、最有思想的人之一。关于“努力在和平的纽带中保持团结”的这段文字中，他还写有：“一些人说你必须有一个宗教共同体，否则你就不能被救赎，而这个宗教共同体就是我们教会，因为我们的教派人数众多也最古老。也有人说：‘我们都是一个宗教共同体，有不同点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他们在无视存在的不同点。然而，圣保罗怀疑在终点之前是否有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宗教共同体，故他不会胁迫我们必须相信他认为不存在的东西。像耶稣一样，他虽渴望我们应该是一体，却预见到不完整性。他说：‘一个主（基督）’，‘一个信仰’（对上帝的信赖），‘一个洗礼’，即一种自我臣服、一种赎罪，而后‘一个上帝和所有人的圣父。’直到最初的洗礼，你可以目睹我们是能够被看得见的一体。最后在上帝那里，我们是不可见的一体。不过，在初始与最终之间流淌的海水是枯涩无味，我们必须走过这段路程。毕竟，我们没有一个像一条道路那样共享团体，而圣保罗避免具体说出哪些是不能实现的。而且，他再一次说‘努力保持团结’。他所说的“保持意味着是小心。让充满爱的目光聚焦在被爱的物体上；让充满真诚的眼睛聚焦在希望上！让充满敬重的目光聚焦在真理的中心点，训练有素的目光聚焦在引导的星星上。‘努力保持精神的团结。’”

史嘉乐主教发言后，美国长老会的惠志德（Wherry）讲述了基督、圣父的力量、爱、和仁慈的方法。他展现了圣父的品格，并说，为了强调传播福音，基督利用医治身体作为有效宣讲的手段。鉴于此，教士们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面临的问题是必须能够实用地展现教义，以便最简单的头脑也能听懂。他还号召训练有素、技能高超的医生帮助其工作，以通过这些具有奉献精神之人的榜样影响人们。这样，基督教教义就容易被理解。高尚的理想将激励中国的年轻人，这将在中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中开花结果并传播到最远的地方。自雒魏林四十五年前作为医疗传教士开始工作以来，在物质上，时代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医疗传教士们，是他们忠诚信仰，并以主的名义克服困难。这种奉献精神把医学与传教捆绑到一起。惠志德相信医院就像一涌喷泉，不仅有医疗技能，还有爱与善意，将在整个中华帝国播散开来。

任牧师（音译）发表讲话后，庄严激动人心的会议宣告结束。

12月13日举行了盛大的公开的开幕仪式。在中国基督教会历史上没有见证过这样多杰出与影响力的人物聚会一堂参加一个教会学院的开业典礼。慈禧皇太后派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作为其代表。此人是朝廷重臣之一。与会之人还有皇家的子嗣们、各种不同组织的会长或副会长们以及很多中国高级官员。所有列强驻华使节也派代表参加典礼。林林总总，这个活动颇具国际重要性，这个仪式是对友谊与善意的贡献。

在开场祷告之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阁下（Ernest Satow）[曾获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的爵士（GCMG）]，主持会议并致辞如下：

大臣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汇聚一堂，参加北京的一所崭新医学堂及医院的开办典礼。这家医学堂与医院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在总体设备与教学人员配备上最齐全和完整的。此情此景，为了表达对这一项目的敬意，我将不妨就其起源讲几句话。人们往往认为，如果在中国首都的各种不同教会，能够在教育工作上联合起来，那么成立一所下设几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不会有太大困难。这种联合让每一所学堂都负担得起聘请足够的员工，用最少的支出产生最大可能的功效。设立了这一目标之后，华北教育联盟（North China Educational Union）

成立了。该联盟由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Mission），伦敦会（London Mission）和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组成，并在科学、神学、文学以及医学几个方面开展教学工作。后期，美部会（America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的汇文大学堂同意将其医学院与伦敦会建立的（学院）合并。此后这个机构将以“协和医学堂”命名，且在医学堂的教务中有华北教育联盟和汇文大学堂的代表负责。圣公会也与该学堂建立联系，并且希望其他教会及组织最终能加入并成为该联盟的全职成员。

各教会都同意尽力承担联盟工作中兴建建筑和配置设备，或某项特殊工作。依照这个备忘协议，伦敦会承担了筹集善款、医疗事务的总体规划，以及提供建筑物及设备的重任。我们今天即将揭幕的建筑就是其成果。

迄今为止，该学堂的校舍及设备的支出金额，达到六万二千六百六十两白银（62660）。这其中华人的捐赠数额为两万二千四百七十七两七钱白银（22477.7）。我想特别指出，这个金额中一万两白银的善款，来自慈禧太后的捐赠。另外的一万零一百一十五两二钱白银（10115.2）来自那桐大臣与赵尔巽的筹集。北京的外籍人士捐赠数额达两千零二两三钱白银（2002.3），伦敦会则贡献了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两白银（38180）。截至今日，支出和收入虽正好平衡，但是如果想要完成医学堂规划中的所有建筑及设备，还需要一万四千两白银（14000）；另外，为了给学生提供宿舍，还需要筹集更多的善款。除去所有这些之外，预计每年还需要两万两白银（20000）用于现有的各项开销。而且我在此可以立刻声明，这些开销并无一丝一毫用于教职员工的薪水。教员的工作到目前为止并不是无偿提供的，这笔费用将由各教会承担。与他们本身的生活便捷与报酬相比，消除病痛和发展科学知识一直是他们最高的目标，这正是我们的内科和外科的专业人士的荣光。

医学堂有可容纳 350 到 400 名学生的演讲堂和教学空间，目前的设想是五年制的课程，每年招收 70 到 80 名学生入学。医院的病房能容纳 40 到 50 位病人，另外还有 50 名病人也可以安排到街道东边门诊部后面的医院。如果现有的这一计划能够成功实现，马上

可以在邻近处修建另外一所独立的医院，并都将用于医学堂的教学工作。同时我们还有一些暂时被用作学生宿舍或者病房，最终会被用作演讲堂的房间。科龄校长已经收到大约 200 名学生入学申请，第一个年级将由这其中的 40 名学生组成。录取的各项章程已经制定完毕，目的是选拔那些最好的学生。毫无疑问当他们毕业典礼时，（学员）人数会达到学堂建立之初设计的满员状态。

很可能有人会问，如此处心积虑建立一所如此大规模的医学堂有必要吗？考虑到华人行医的历史长达好几个世纪，这个国家所拥有的巨大人口基本上一辈子都满足于用传统医术去治疗疾病，而不去寻找自己传统方式之外的治疗方法。然而，对中国来说，还有很多未知的疗法，也是西方科学已经发现可用、并且可推介的方法。比如氯仿麻醉及其他麻醉术，抗菌以及无菌的方法。这大大拓宽了医学领域，使以前认为无法治疗的病例可以用手术成功进行治疗。听诊器的使用以及更准确的诊疗手段，治疗肆虐中国大城市的肺结核之新方法，改良的且更有效的疫苗，血清的配备和使用，如抗毒、抗狂犬病、抗链球菌以及抗毒剂，都已经证实如此成功地治疗了过去人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医治的疾病；还有使用伦琴线等所有这些完美的西方外科医生的装备。此外，西方医学还可以传授正确的科学观察和推理方法，以及针对远东的特有疾病的更好阐述方法。这是西方医学科学所能提供的好处。对于外科来说，拓展了更多前所未有的领域。我在这点上一点没有夸大，人类生来就遭受躯体的苦难，始终是个可怕的话题。然而，通过外科医生手术刀及烧灼，可以恢复健康与活力，是所有赞同提高人类福祉的人们所欢欣鼓舞的话题。

最后，大家可能已经评论过这所建筑物的另外一个名字，鹤立在这个建筑屋顶上，在尽可能最显眼的位置上刻着——雒魏林学院（Lockhart College）。人们认为是他缔造了北京的外国医疗传教会，其名字应该用这样的方式流芳百世。在我刚到这座城市居住时，有幸会见过现在已经不在人世的雒魏林博士（Dr. Lockhart），他对我一直非常友善。雒魏林于 1838 年来到中国，他打算在广州工作，那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无法在那里定居。接下来的几年，他在澳门开

了家医院。从1843年到1857年，他在上海继续医学传教的工作。1861年9月，他抵达北京。不久，他在英国公使馆旁边找到了一座房子。在这里，他不辞辛苦地尽其慈善之举，三年之后才返回英格兰。现已去世的德贞（Dudgeon）大夫接替了他。1867年魏林从伦敦会的职务上退休，在布莱克海斯（Blackheath）定居，并于1896年在该地去世。他的一生充实，也是他的国家的荣耀。我期待这座为纪念他而修造的楼房，在未来能够被世世代代保持如新。

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演讲结束之后，外务部会办大臣那桐大学士致辞如下：

在协和医学堂及其医院开办之际，与诸位相聚深感荣幸。作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有幸向所有在场的嘉宾致以最热情的欢迎和问候。太后对协和医学堂甚为关注，为建立医学堂慷慨解囊而捐赠了大笔款项，并对那些为这所最有用、且也是最为需要的机构的建立做出努力的人士致以崇高的感谢之情。太后特意委派敝人出席这个喜庆的典礼。科龄博士负责规划了协和医学堂。他是一位在其专业领域成绩卓著的绅士，在此项事业中不遗余力并取得成功。他造就了这所拥有优秀师资的现代医学堂，在场诸君今日汇聚于此恭贺开办。科龄博士之所以能够收获这么令人满意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得到了各位的精诚合作。这包括陛下、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爵士以及总税务司赫德爵士（Robert Hart）。奉天（沈阳的旧称）盛京将军赵尔巽以及许多其他显赫的中国官员们都鼎力相助，做出了突出贡献。为此功德无量之事略尽绵薄之力，敝人颇感欣慰。我们在很短时间内看到这栋重要的建筑物矗立起来，准备好开业并开始施展其用途，是件可喜可贺之事。敝人在此谨衷心希望协和医学堂繁荣昌盛之景延绵不绝，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其全体教师以及毕业生，成为一所不可估量地造福于所有华人的机构，名扬四海，在整个中华帝国名声遐迩。

柔克义（Hon. W. W. Rockhill）阁下随后发表了演讲，在演讲中，他说：